

比较文学理论辑要

比较文学理论辑要

陈秋峰 选编

上海师院中文系
文学理论教研室

一九八四年五月

编者絮语

近年来,比较文学学科正在我国迅速兴起,不少高校文科相继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在此,我们择选了若干散见于各处的有关此门学科的理论译作和著述汇编成册(共十九篇),以应教学之急需。

本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八篇译作,主要论述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我们按其发表的时间顺序加以排列,供了解它的沿革、发展概貌;第二部分六篇著述为国内学者对此门学科理论的介绍评述,旨在使学生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派、现状及在我国的进展近况有一大致的把握;第三部分的五篇文章,前四篇为外国百科全书论比较文学,后一篇则对该门学科的建立、大学课程的设置、师资素质及领导见识等方面提出了中肯的见解,因而也选编入内。

有关各篇所涉的人名译名,本书仍保持其原文面目。

鉴于水平所限,本集内容尚显单薄、编排亦不尽科学,以待今后再作补充修订,使其日臻完善。

一九八四年五月

目次

编者絮语	(I)
比较法和文学	[英]波斯奈特(1)
附录: 介绍波斯奈特及其《比较文学》	
总体文学、比较文学和国别文学	[美]威莱克、沃伦(21)
附录: 介绍威莱克及其《文学理论》	
比较文学	[法]马·法·基亚(45)
比较文学的危机	[美]雷内·韦勒克(67)
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	[美]亨利·雷马克(81)
文学借鉴与比较文学研究	[美]约瑟夫·T·肖(102)
文学的相互联系对社会主义文学形成的作用	[苏]涅乌波科耶娃(117)
比较文学导入方法的回顾	[日]小林路易(149)
我国比较文学研究展望	廖鸿钧(176)
比较文学理论渊源与发展	于永昌(187)
比较文学: 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	王贤良 徐振远(205)
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	卢惟庸(214)
比较文学在苏联	陆永昌(224)
港台和海外学者之中西比较文学研究	温儒敏(235)
法国《拉罗斯百科全书》论比较文学	(243)

比较法和文学(节录)

[英] 波斯奈特 著

周 纯 译

第二十一节

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这种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说在我们十九世纪特别盛行。一切推理，一切想象都是主观地进行的，然后借助于比较和区别客观地递相流传。逻辑学家最最不偏不倚的命题或者是肯定一种比较，即 A 就是 B，或者是否定一种比较，即 A 不是 B；任何研究希腊思潮的学者都会记得，由于弄错了连系动词(copula)的性质而使这个过程发生了混乱，而这种混乱又如何产生了一次所谓“实质”(essences)的泛滥，其结果是在难以估计的程度上把古典哲学和现代哲学都引入了歧途。然而，不仅是不偏不倚的逻辑命题，甚至于演说家的雄辩术或者诗人的幻想，其最高最光辉的境地也是靠比较和区别这种基本结构支撑的，靠我们可以称之为人类思维的这种原始的手脚架支撑的。如果说实事求是的经验在肯定或者否定比较的命题中得出科学真理的话，那么想象，即使最最丰富多采，也是在同样的基本形态中进行的。雅典的知识界和亚历山大的（指在埃及亚力山

大地区发展的古希腊文化的——译注）有识之士都没有能够理解这个基本真理，主要原因在于希腊人的某些社会特征。集团如同个人一样，如果想要了解自己的特征，需要设想自己处于与自己交往的圈子以外；然而，希腊人由于蔑视本国语言以外的任何语言，那条后来通往比较哲学的康庄大道对他们来说却是此路不通了。同时，希腊人对自己在极其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的比较是狭隘的，狭隘的原因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遗迹，更多的原因是由于蔑蔑那些文化较低的希腊人，例如马其顿人(Macedonian)，尤其是因为有一大堆神话故事，久已神圣得使科学不敢去侵犯，而且又错综复杂得使没有耐心的怀疑论者无法着手去把它解开，使之成为有益的东西。就这样，对自己的过去失去了历史的研究，而又囿于自己业已发展成熟的语言所允许的比较和区分，希腊人在比较思维方面不仅出于不自觉的行动，而且由于有意识的考虑而进展甚微，就不足为奇了。这种有意识考虑的结果，就是以往五个世纪里欧洲思潮的成长，开始确实是一棵孱弱的幼苗，但是，由于近期的根源，现在正在茁壮成长。

当但丁写《论通俗语言》(De Eloquentia Vulgari)一书时，他标明了我们现代比较科学的起点——语言的性质，一个现代欧洲各国人民不容轻易忽视的问题，他们和希腊人或者希伯来人(Hebrew)不同，继承了一种文学，这种文学是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这种语言解体后明显地构成了希腊自己的活语言的要素。拉丁文艺复兴，然后接着是希腊文艺复兴，在现代欧洲的思想界打下了比较思维的基础。在此期间，欧洲各国的兴起产生了新的观点、新的材料，在现代风俗以及思想或感情的方式方面进行比较。美洲的发现把这个新的欧

洲文明同原始生活摆在面对面的地位，并且唤醒人们去同自己的伙伴进行对比，这种对比比拜占庭人(Byzantine)或者撒拉逊人(Saracen)（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十字军东征时的阿拉伯人或伊斯兰教叛的称呼——译注）所能提供的还要显著。通商贸易这时也使得欧洲各个新兴国家互相竞争，互相了解，而且，不止如此，它还给西方的市民带来比他们以前所曾享受过的更大程度的个人自由。与增加财富和自由的同时，在人们中间出现了个人意见的觉醒，甚至出现了个人意见起来反对权威，从此，这就被称为改革运动（指十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改革运动——译注）。但是，在封建、君主和“民众”冲突的时代，在教育是少数人昂贵的奢侈品的时代，在传送日常消息也由于糟糕的道路和更糟糕的是有土匪而既缓慢又不正常的时代，个人意见的兴起即使在号称建树过伟大业绩的国家里也很容易地被制止了。个人的探讨以及随之而来的比较思维被同神学教条的经常冲突牵制在社会生活的领域里，这时转向物质世界，开始积累大量丰富的物质知识，而且只是在后来的自由时代开始从这一物质方面建立起关于人类起源和命运的世俗观念，这种观念以前在社会方面是被教条所抑制的。在此期间，欧洲对千变万化的人的社会生活方面的知识正在大量增加，远远超过培根(Bacon)或者洛克(Locke)所曾期望的程度。基督教传教士们把中国的生活和文学如此生动地带回来传给欧洲人，以致不论是伏尔泰的艺术还是他的怀疑论都没有使他不屑于借用耶稣会教士马若瑟(Prémare)翻译的、1735年出版的一部中国戏剧(指《赵氏孤儿》——译注)。然后，在印度的英国人了解了那种古老的文字，将近十八世纪末，威廉·琼斯爵士 1735(Sir

William Jones)把它介绍给了欧洲学者；不久人们注意到这种文字同希腊文和意大利文、条顿(Teuton)文(条顿人相传为日耳曼人的一支——译注)和凯尔特(Celt)文(凯尔特人系指公元一千年左右住在中欧和西欧的部落集团——译注)之间的相似点，就把这些相似点当作许许多多踏脚石，踏着它们在想象中跨过把古老的雅利安人(Aryan)同他们在西方的近代支族后裔分开的时间洪流。从那时起，比较的方法还被用于语言以外的许多学科；许多新的影响结合起来促使欧洲的思想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愿意进行比较和对比。蒸汽机、电报、每天的报纸这时把地方和中央、通俗和教养、每个欧洲国家的生活和全世界总的行动摆在面对面的位置；比较的习惯空前普遍，风行一时。但是，虽然我们可以把有意识的比较思维称之为我们十九世纪的盛况，让我们不要忘记，这种思维主要是由于机器的进步引起的；远远在我们的比较语言学家、比较法学家和比较经济学家等人以前，象饶埃希林(Reuchlin)那样的学者就使用过同样的方法，虽然没有那么有意识，没有那么准确，然而一开始就不象希腊评论界的观点那样孤高，而是预示出广阔视野。以上就是比较思维在其欧洲的历史中的粗略梗概。这种思维，这种思维的方法和我们的题目“文学”又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呢？

第二十二节

人们注意到，想象完全和经验一样，是通过比较的手段进行的；但是，人们经常忘记，这些比较的范围在时间和空间、在社会生活和物质环境方面远非不受限制的。如果说

科学想象——如同庭道尔教授(Professor Tyndall)有一次解释、说明的那样——是受假设法则严格约束的话，那么，看上去如此自由的文学家的魅力是同样严格约束在他这个集团的语言已经表明的概念的范围之内的。文学家不同于科学家，他不能为了要传播新的概念而去造字；因为，他的诗歌或者散文不同于科学家的发现，必须适应平均的智力，而不是特殊的智力。字眼在他可以使用之前，必须从特殊的用途转为一般的用途；而且，正如各类知识（法津的、商业的、机器的等等）按照专门的程度得到发展一样，文学语言和科学语言之间的区别，团体的语言和概念同该团体专门部分的语言和概念相比，区别就更加显著。如果我们探索任何文明社会从孤立的氏族或者部落中的兴起，我们就会注意到一种与文学的语言和概念紧密相连的双重发展——这一社会的向外扩展，这是一个伴随着思想感情的扩展的过程；在内部，活动的专业化，依靠这个过程，产生了一个有闲情逸致的文人阶级，不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后者就是为经济学家所熟悉的分工过程，前者则系为好古之人所熟悉的较小的社会集团合成较大社会集团的过程。当比较的范围从氏族的扩大到民族的甚至世界规模的交往和一致性的时候，专业化的过程把概念、文字和书写方式从文学的专门领域里划分出去。这样，在荷马的时代，希腊人民大会(Agora)上的讲演并没有什么职业化的地方，它是诗歌的一个固有的题材，但是，在职业化的雅典雄辩术的时代，讲演同戏剧是不一致的，它的讲演学校的味道太浓。阿拉伯“蒙昧时代”（指七世纪伊斯兰教建立以前的时代，其后史称“黎明时代”——译注）的诗人歌唱他们的氏族生活；斯宾塞(Spenser)洋溢着民族热

情；歌德和维克多·雨果甚至超越了民族命运的思想。由于扩展和专业化这两个过程，文学的语言和概念逐渐脱离任何高度发展的社会中某些阶级的特殊语言和特殊概念，文学不仅由于它的想象的性质，而且由于它的语言和概念不属于任何阶级而逐渐与科学区别开来。事实上，每当文学语言和概念在某种意义上不再是共同财富时，文学就趋向于或者模仿，或者变得专业化，变成穿着文学外衣的科学——正如近来我们不少抽象诗（十七世纪英国以约翰·唐 John Donne 为首的诗派——译注）那样。象这样的事实突出地说明了比较思维同文学的比较法之间的关系。共同语言和思想的圈子，一个集团的比较思维的圈子难道同一个部落联盟一样狭窄吗？或者，是否许多这样的圈子结成一个民族集团了呢？牧师和歌手的职务是否仍旧结合在一种巫术的仪式中？或者，职业和行业是否已经发展到了可以说是各自为了实用目的而有自己的行话了呢？我们必须记得，社会生活中的这些内部和外部演变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它们进行比较和区别，却不考虑其性质或限制；我们必须记得，自觉地去追溯这种发展，寻找引起发展的原因，这是反映性比较的事情，是比较法的事情。现在让我们用一种不那么抽象，一种较为接近生活的方式来看看这种比较在文学上的运用。马修·阿诺德先生为评论的作用下定义，说它是一种“公平的努力来学习和宣传世界上为人所知和为人所想的最好的东西”时，他很小心，他加上了一句，说许多这种最好的知识和思想并非英国的而是外国的产物。在这个国际文学的时代，英国的评论家必须大量地同外国的成果和精华打交道，有时还要同荆棘之作打交道。他不能满足于本国文化的

成果，尽管这些成果可以是迥然不同的，从撒克逊荒地上的野果到伊丽莎白（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译注）时期的大量粗糙作品，从蒲伯（Pope）的优雅的工整风格到今天的民主情趣。最近，戴莫肖（Demogeot）先生出版了一部饶有趣味的著作（《外国文学史》，巴黎，1880年——原注），研究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德国对法国文学产生的影响；我们英国的评论家也必须对本国文学做同样的研究。在我国文学前进的每一个阶段，评论家事实上不得不或多或少地把目光投向本国海岸以外的远方。他是否陪伴乔叟（Chaucer，史称“英国诗歌之父”，著有《坎特伯雷故事集》等作品——译注）去朝圣并且倾听香客们的故事？南国的芳香洋溢在塔巴德客栈的四周，并且飘荡在通往坎特伯雷的道路上，使他思慕向往着但丁以及佩特拉克（Petrarch）和卜伽丘（Boccaccio）的意大利。他是否观看德莱克和费洛比舍吃苦耐劳的水手们在英国的港口卸下大量的西班牙战利品，并且倾听显赫的船长们满口从菲力普二世豪侠的臣民们那里学来的漂亮话？塞万提斯和洛普·德·维加（Lope de Vega）的西班牙出现在他眼前，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新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用通商或者幻想的翅膀把他带到喧闹的卡迪兹港和西班牙大公的宫殿。高雅的绅士们身边佩戴的西班牙的轻剑，嘴里操着西班牙的词句，身上穿着为西班牙情调所欣赏的服装，穿过伊丽莎白时代伦敦狭窄而又肮脏的街道来来往往。粗俗的戏院里回响着西班牙的典故。而且，要不是英国人和西班牙人在海上你死我活的竞争，要不是英国人害怕西班牙支持教皇的干涉，英国的赫利孔（Helicon，比喻诗的灵感的源泉，典出希腊神话——译注）可能会忘记意大利共和国的落日而去享受西班牙影响的

灿烂阳光。可是现在我们的评论家站立在查理二世的白厅里（现为英国政府机关所在地——译注），或者坐在威尔的咖啡馆里，或者进入那些戏院，这里近来上演的王政复辟（指1660年查理二世的复辟——译注）的戏剧使他的清教徒朋友们（指英国内战时期反对理查一世的议会党人——译注）大为伤心。到处都一样。西班牙的言谈举止被遗忘了。在宫廷里，白金汉(Buckingham)等人用法国的花束来为他们放荡不羁的机智增添芳香。在威尔的咖啡馆里，德莱顿(Dryden)颂扬拉辛(Racine)的韵诗体悲剧；戏院里布景华丽而俗气，是莎士比亚戏剧中所没有的，里面坐满了观众，他们在幕间休息时闲聊法国的评论，对无耻的粗俗和外形对称的美报以同样热烈的掌声。不久，英国的布阿娄(Boileau)将把法国的异国文化传播进来，达到英国的温室所许可的地步；不久，那种怀疑论将从波林布洛克(Bolingbroke)传到伏尔泰，并且从伏尔泰再传到革命党人那里去，那种怀疑论被宫廷、法庭和议会的温文尔雅的伤风败俗在至今还掌握英国命运的少数人中间弄得很时髦。我们不需要陪伴我们的评论家到魏玛去，也无需乎同他一起从英国对法国及其革命的反感中去寻找一些德国影响的渊源。评论家业已证明，我国文学的历史不能单独用英国的原因来解释，恰如英国语言或人民的起源不能这样解释一样。他业已证明，每一个国家的文学是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不仅吸引本国的力量，而且也吸引国际的力量。我们感谢他使我们看到一眼如此广阔、如此千变万化、如此充满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发展过程；这是用比较法研究文学的一个方面，然而，尽管它有明显的广度，这仅仅是一个方面而已。国别文学既从内部得到发展，又从外部受到

影响，而对这种内部发展的比较研究比外部远远更为有趣，因为前者主要的不是模仿的问题，而更多地是一种直接取决于社会和物质原因的演变。

第二十三节

因此，学者将转向国家发展的内部根源，不论社会方面的或者物质方面的，转向这一发展的不同时期对文学的影响，并把这些当作科学研究的真正领域。他将观察社会生活从氏族或者部落集团的狭小圈子向外扩展，这些氏族或部落集团具有那种可以存在于这样狭小范围内的思想感情，他们在原始的诗歌中表达亲密的兄弟之情，表达他们对个性的淡薄观念。学者将观察在取代了原始共产主义的封建社会里，个人感情在孤立生活中深化，他将观察这种感情在颂扬个人英雄的歌曲中的反映，观察在社会组织的这一变化中，人、自然和动物——例如马、狗、鹰在封建诗歌中——的生活所呈现的新面貌。然后，他将注意一种新的共同生活在城市中的开始。在城市的街道上，氏族的排外感情将要湮灭，封建人物惊人的自大将要消失，个人和集体性格的新形式将要出现，戏剧将要取代早期部落唱歌或者酋长厅堂歌曲的地位。接着，场景将转变为君主国的宫廷。在这里，城市居民和封建领主的感情正交织在一起；在这里，对古典模式的模仿补充着正在形成中的国家统一的影响；在这里，文学空前地反映出一个更加开阔的社会，一个关于个性的更加深刻的意义，它在一位伊丽莎白女王或者一位路易十四的庇护下产生出巨著杰作。学者在观察社会演变对文学的这种影响时，绝对不会把

自己的眼光局限于这个或者那个国家。他将发现，如果说英国有过氏族时期的话，那么，一般说来欧洲也都有过；如果说法国有过封建诗歌的话，那么，德国、西班牙和英国也都有过；虽然在整个欧洲，城镇的兴起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了文学，这些影响有其共同的普遍特点；在我们欧洲各国，关于中央集权的情况也可以这样说。如果你追溯基督教教士或司法机关或群众大会对不同欧洲国家散文发展的影响，你很快就会发现，内部的社会演变是如何相似地反映在文学的文字和思想上，任何准确的文学研究应该从研究语言进而研究为什么会允许语言和思想达到能够支持一种文学的条件，这是多么必要；这种研究必然是一种比较和对比的研究，这又是多么渊博。但是，我们不应该低估我们在追溯这种内部演变对一个国家的诗和散文的影响时所遇到的困难。我们不如一开始就承认，这种演变容易因为模仿外国模式而被弄得模糊或者完全被淹没。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种模仿的一个例子。

罗马和俄罗斯的情况足以证明，外来影响一旦超过了某一点，就会把文学从它所隶属的集团的产物变成一种纯粹的舶来品，这种舶来品仅仅值得当作一种间接依赖于社会生活的人工产品加以科学研究。如果让一种说话的工具形成，让一个社会中心建立起来，给一个能够自给自足的文人阶级以兴起的机会，那么，只有一般民族观念的强大潮流或者对外国和古代模式的绝对无知才能避免产生模仿的作品，这种模仿作品的素材和编排不论同本集团特有的素材编排多么不相象，都可能是从极为多种多样的气候、从截然相反的社会状况、从属于完全不同的时代关于个性的概念中借鉴而来的。

这样的事情在下述情况下特别可能发生，即在一个比较不太文明的国家里，少数有教养的人熟悉了那些已经经历文明的许多阶段的人的文学模式，而那些人看上去又可以省去自己在国内重复同样的、费力的提高所需要的时间和麻烦。罗马的模仿文学就是这种借鉴的一个熟悉的例子；俄罗斯的模仿文学有一段时间看上去似乎注定要几乎同罗马以往仿效希腊一样紧密地仿效法国模式。有目共睹，这种对法国模式的模仿必然掩盖了俄罗斯生活的真正民族精神，在他的野蛮的历史上披上了一层傲慢无知的面纱，并且在她的文学中以一个俄罗斯——高卢（指法国——译注）集团的空想的艺术作品取代了本国文学发展的位置。在一个社会生活过去和现在都是以公社组织“米尔”（Mir，或农村村社）为基础的国家里，法国高度个性化的文学变成如此受人欢迎的模仿渊源，以致把那些民歌完全扔到了不重要的地位。现在，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复兴精神以及一般说来欧洲的社会研究中的复兴精神终于开始仔细考虑那些民歌了。这种俄罗斯对法国的模仿可以用坎特米尔亲王（Prince Kantemir，1707~1743）的作品来说明，他曾被称为“俄罗斯的第一位作家”，是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朋友，在他的书信体诗文和讽刺作品方面，是布阿娄和贺拉斯（Horace）的模仿者；也可以用罗蒙诺索夫（Lomonosoff，1711~1765）的作品来说明，他曾被称为“俄罗斯第一位经典作家”是沃尔夫（Wolf）的学生，莫斯科大学的创始人，俄罗斯语言的改革者，他试图通过对彼得大帝和伊丽莎白女皇（在此指十八世纪的俄国女皇——译注）的学术性谏辞（古希腊对生前有功勋的死者下葬时的赞辞——译注）来弥补不足，写出那种只有自由集会鼓励使用的、真

正适合讲演用的散文，他试作一篇史诗体的《彼得颂》(Peteid)以颂扬伟大的沙皇，并且模仿法国抒情诗以及平达(Pindar，古希腊抒情诗人——译注)，写下了他的颂诗*；或者也可以用苏玛洛科夫(Soumarokoff)的作品来说明，他为伊丽莎白女皇所建立的圣彼得剧院改编或者翻译高乃依(Corneille)、拉辛和伏尔泰的作品，很象普劳图斯(Plautus)和泰伦斯(Terence)以前在罗马介绍雅典的戏剧那样。正如在罗马，在古老的罗马家庭感情和希腊人的个性化精神之间发生过冲突一样，正如在罗马，地位显赫的贵族乐于把家庭生活的陈旧感情以及象农神节(古罗马节日，在十二月中旬——译注)那样陈旧的格律换成希腊的有教养的思想和悦耳的韵律一样，在俄罗斯，在为宫廷和贵族所珍视的法国个人主义以及俄罗斯团体和家庭的社会感情之间也发生了冲突。俄罗斯思想最古老的纪念性作品——僧侣涅斯托尔(Monk Nestor, 1056~1116)的编年史(涅斯托尔为基辅山洞修道院的僧侣，编年史家——译注)和《伊戈尔之歌》(Igor, 谢维尔诺夫戈罗德的大公，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即以他的远征为主题——译注)——同《布依利那斯》(Builinas)和民歌一样，不大可能吸引这种模仿者的注意；在一个从未经历过西方封建制度及其骑士诗，在一个没有听说过文艺复兴和改革运动的国家的人们中间，这时来了一个对西方进步的模仿，有一段时间，这种模仿有证明它对民族文学是致命的这样的危险，正如在罗马模仿希腊思想已经证明的那样。在这个“欧洲的中国”(俄罗斯由于她的家庭感情和对沙皇的耿耿忠诚曾被这样称呼)，法国的，以后是德国和英国的影响清楚地表明了一个科学的文学研究者由于脱离社会生活而从事模仿工作